



人
文
中
国
书
系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王尔敏 / 著

近代文化 生态及其 变迁



K250.3/6

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

◎ 王尔敏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王尔敏.—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1

(人文中国书系)

ISBN 7-80647-340-8

I. 中... II. 王... III. 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K2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5051 号

书 名: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
作 者:王尔敏
版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发 行 址:WWW.BHZWY.COM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4.5
字 数:30 万
版 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ISBN 7-80647-340-8/G·67

邮政编码:330002 电话号码:0791-8503450 8508674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校稿完毕之际，特撰简约序文，先此呈献学界求教，深盼邀得大家鉴赏。

我自投身于学术界已五十年，承业师郭廷以（字量宇）先生的庇爱，列于大师门下做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我自然是郭门后进弟子，勉为附骥于前期诸学长之后，极其努力，得以追从其后。

我得郭廷以先生教导鼓励，培植学问有加，乃能在五十年来，得有学术建树，敢于自期有专业特长者，略可列举。大约中国近代思想史有著作专书两种、论文四十余篇；中国近代军事史有专书三种、论文数篇；中国近代外交史有专书一种、论文十数篇；基督教史有专书一种、论文数篇；明清社会文化史有专书两种（本书不计），史学方法有专书一种。此外对于近代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也还算具专长地位。以上就是我在治学方面的大致专业特长，愿意以文会友，在学术界接受任何挑战。须知文章是天下之公器，本书出版，也是提供于学术界，欢迎各界的批评指教。

我除做研究之外，还在大学教书，开一些课程。现今仍在教书，所教有博士班两门，即：中国古代典籍介绍；掌故学。硕士班两门：方志学；历史地理。现已约定，到今年暑假过后就停止教书，真正做到退隐林泉。如果尚有余力，则仍是照样撰写文章。

◆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

我是一个纯粹书生，一生只与做学问为伴。凡读我的书与文章，自会估断我一生的志节立场与学问造诣，当不待我多言。

我出自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所受教于名师甚多，其中影响我最深的是郭廷以老师和沙学浚老师。两人对于我毕生治学有极深影响。郭廷以先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师，带领我在近代史领域作各样开拓。特别是他的年代学和他的史家通识，我可说是毕生服膺，也是感仰师恩不尽。沙学浚先生是地理学名家，他的眼光远大，气魄宏阔。举沙老师著名论文，如《从政治地理看胡人南下牧马》、《西安时代与北京时代》、《南渡时代与西迁时代》、《楼兰绿洲的存废与汉唐经营西域之路线》、《从地理观点看亚洲历史的发展》等等，可以说不胜枚举，往往从一个观念入手，贯串古今全局，文章气势磅礴，浩瀚无有即极。我自用心学习沙老师的以简驭繁处理大问题。

郭廷以老师门下弟子人才济济，我只是郭门的末学后生，像海内外声名洋溢的中国外交史学大师唐德刚先生，才是郭门大弟子。著名的尚有王聿均、吕实强、李国祁、陆宝千、王家俭、李恩涵、张朋园、张玉法、林明德、陈三井、黄福庆、陈存恭、魏秀梅等等，不及备举。我不过是郭老师门下一个最后的守门人而已，不能与诸位学长雁行并列。因为是学问不如，难成大器。我费些笔墨略叙近代史学界师友，是让国人知道我的道行不过尔尔。近代史学领域中正有不少一流高手，应该会观各家著作，以为评量，我深信大家的心胸都是很开明开放的。

现在可以进一步交代一点有关撰著本书的经历，这是新近颇受史学界特别是明清史家所大加注意的论域。我的动机开始，是在1968年访问美国之后，而用心于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问题。有三位学者给予我推动的影响。一位是加州大学刘广京教授，一位是夏威夷大学郭颖颐(Prof. Danny W. Y. Kwok)教授，

一位是较早时期应屈万里老师的开会邀约而见到的日本学界代表团团长酒井忠夫教授。刘先生、郭先生给予我一些理论方面的启发。而酒井忠夫先生则毕生研治明清庶民文化史,他的著作,大都寄赠给我,引导我仿效这位大师的选材与治学的精神,随即展开对明清社会文化史资料的搜辑工作。

我的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最初自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入手,主要动因是处理军事史上太平天国军力在长江下游的扩张问题。此点虽是军事史,却不免进入研究小刀会这类秘密会社。经过一连撰写三篇论文,奠定下我的秘密会社史的功力与声誉。我随后就展开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著有论文若干,并于1997年出版拙著《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今日刊布本书,则是选辑其他相关文化生态与文化变迁的问题结集而成。承欧阳哲生教授的鉴赏,推荐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刊印问世。我不须在此多作介绍,但望读者阅读欣赏,就是我的光荣。同时要向张国功先生深致谢忱,自2001年6月书信联系,承他耐心编校,费心不少,特向他申谢。

2002年2月2日

河南周口王尔敏于台北之善刀书屋

目 录

自 序/1

上编 文化生态

清廷《圣谕广训》之颁行及民间之宣讲拾遗/3

儒学世俗化及其对于民间风教之浸濡

——香港处士翁仕朝生平志行/31

传统中国庶民日常生活情节/61

中国传统记诵之学与诗韵口诀/101

明清以来民间之文字游戏与庸俗诗裁/145

《茉莉花》等民歌西传欧洲二百年考/176

下编 文化变迁

中国近代知识普及运动与通俗文学

之兴起/195

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

之自觉及国语运动/291

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传播之图说形式

——以《点石斋画报》为例/339

《点石斋画报》所展现之近代历史脉络/399

中国人与礼拜日制/431

附录 王尔敏著述要目/448

上 编

文化生态

清廷《圣谕广训》之颁行 及民间之宣讲拾遗

在清代二百余年历史中,《圣谕广训》是朝野最熟知之书,大致除去《时宪通书》及《万宝全书》两种之外,《圣谕广训》为全国第三种最通行之普通书籍。不过若就生活需要与应用功能而言,《时宪通书》(亦称为《通胜》)是平民乃至官家每日必用之书,真是家家必备。《万宝全书》则是平民必备,官家不用。惟在《圣谕广训》则十分不同。其虽是官民必备,却是备而不用,既无实用需要,亦非真心要读。《圣谕广训》正表露清代政治环境中,清廷皇帝之统治宗旨与驭民智术。其书册分量不大,实具经典效用,并深蕴帝王之统治智术。故而《圣谕广训》虽是清代官民之间的畅销书,实由于政治诱因,使之不得不然。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清代长久时期,凡要知书求科甲功名,必须熟读《圣谕广训》;既要科考,无论县考、府考,三场考试,其中必有默写《圣谕广训》之考试,抑且不可有错,决不可误写或添改。一般情况,是在第二场考试“四书学”,附带默写《圣谕广训》,^①故凡科考必经默写《圣谕广训》。由于官禄之引诱,足使知书之士必须熟读。

① 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1958),4~5页。

◆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

事实上《圣谕广训》一书,在清廷帝王统治政术上,是深思远虑之创造,经过两段时代、两个皇帝之用心,方始完成。其宗旨正大,设想周全,艺术超卓而用心深隐。质言之,《圣谕广训》是康熙手创十六条目,经雍正广解义蕴,两代用心发展而成。其宗旨在图谋清室统治之长治久安,使全国民众永久驯服效命之设计。

清圣祖仁皇帝玄烨,幼年践祚,自康熙七年(1668)方始亲政,嗣后天下政令俱当出其一手经画。清圣祖亲政不久,即在康熙九年(1670)十月癸巳日给礼部一道上谕,颁布圣谕十六条,特引据如下:

癸巳谕礼部: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厚,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长治久安,茂登上理。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近见风俗日敝,人心不古,器凌成习,僭滥多端。狙诈之术日工,狱讼之兴靡已。或豪富凌轹孤寒,或劣绅武断乡曲,或恶矜出入衙署,或囊棍诈害善良。萑苻之劫掠时闻,讎忿之杀伤叠见。陷罹法网,刑所必加,诛之则无知可悯,宥之则宪典难宽。念兹刑辟之日繁,良由化导之未善,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讎忿以重身命。以上诸条,作何训迪劝导,及作何责成内外文武该管各官,督率举行。尔部详察典制,定义

以闻。^①

此一上谕,具有划时代意义,其所设计圣谕十六条,遂成为此后清廷二百余年统治中国庶民之一定条目,未再有所改变。

清圣祖颁布上谕之时,并未明白指示如何下达万民。随后同一诏书竟然被臣下修改,而在上谕结尾有明白具体施行方针。此在清廷档案文书上最值得注意,即是同一皇帝上谕,实有文字上之重大出入。照清廷官文书惯例而言,军机处上谕,多与内阁明发上谕有所不同,甚至同一上谕日期相差数日,内阁永远是时间落后。此俱指同一上谕而言。今核校《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康熙九年十月癸巳同一上谕,前段全同,及至结尾处“以上诸条”之下,则改为“著通行晓谕八旗并直省各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②。此即通令施行全国及于乡村庶民之正式指令,臣下各级官吏当须奉命遵行。不惟如此,圣祖更明白标示,清朝自世祖起即表现其以孝治天下,重视《孝经》。因是指示臣下,编纂《孝经衍义》,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五月壬戌编成刊布。^③

《圣谕广训》先后出于康熙、雍正两位皇帝之手,其间划分十分清楚,当时记载,见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三月《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等之校后谨按语:

《圣谕广训》一卷,圣谕十六条,圣祖仁皇帝所颁。广训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台北:华文书局影印)卷三四,10~11页。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卷六《圣治卷》。

③ 《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卷一一记:“礼部右侍郎张英等,以编纂《孝经衍义》告成,进呈御览。上曰:《孝经》一书,皇考世祖章皇帝以孝为万事之纲,五常百行皆本诸此。命儒臣博采群书,加以论断,名曰《孝经衍义》。朕继述先志,特命纂修。今书已告成,著刊刻颁发,以副皇考孝治天下至意。”

◆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

一万余言，则我世宗宪皇帝推绎圣谟以垂范奕世者也。^①

清世宗宪皇帝胤禛，在雍正二年（1724）二月初二日对于圣祖圣谕详细加以申解，成广训一万余言，乃成传世之《圣谕广训》一卷。广训之外，并为此书作序，即定于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是即《圣谕广训》确定成书之日。兹节举序文后半于下：

谨将上谕十六条，寻绎其义，推衍其文，共得万言，名曰《圣谕广训》。旁征远引，往复周详，意取显明，语多真朴。无非奉先志以启后人，使群黎百姓家喻而户晓也。愿尔兵民等仰体圣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视为条教号令之虚文。共勉为谨身节用之庶人，尽除夫浮薄嚣陵之陋习。则风俗醇厚，家室和平，在朝廷德化乐观其成，尔后嗣子孙并受其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其理岂或爽哉。^②

清世宗就圣谕十六条，逐条推衍申论，抒为训诰，以传示天下部民。不但庄敬恭肃，以见其绍述圣祖，抑亦词旨恺悌，以示其爱民惇诚，在此无须一一备举。而《四库全书》纂录诸臣，抄缮特别恭谨，各将其十六篇广训一一注示字数，今附志于下：

- 一、敦孝弟以重人伦 六百三十二字
- 二、笃宗族以昭雍睦 六百三十字
- 三、和乡党以息争讼 六百零五字
- 四、重农桑以足衣食 六百三十八字

① 《圣谕广训》（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按语，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

② 《大清世宗宪皇帝圣训》（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卷九《法祖卷》。

- | | |
|------------|--------|
| 五、尚节俭以惜财用 | 六百四十三字 |
| 六、隆学校以端士习 | 六百三十四字 |
| 七、黜异端以崇正学 | 六百四十字 |
| 八、讲法律以儆愚顽 | 六百三十二字 |
| 九、明礼让以厚风俗 | 五百九十九字 |
| 十、务本业以定民志 | 六百字 |
| 十一、训子弟以禁非为 | 六百二十五字 |
| 十二、息诬告以全良善 | 六百十九字 |
| 十三、诫匿逃以免株连 | 五百九十字 |
| 十四、完钱粮以省催科 | 六百四十一字 |
| 十五、联保甲以弭盗贼 | 六百二十八字 |
| 十六、解讎忿以重身命 | 六百四十四字 |
- 总共一万言。

在此要进一步解说,清代历朝编有圣训,后世合称“十朝圣训”,与《圣谕广训》合观,原无若何区别,惟就功能宗旨而言,则有显著不同。简单陈说,大清历朝圣训明显在仿效明太祖之《洪武宝训》,固然在传示子孙,实在维系其天家之独特传承,功用在帝王天家传世心法。用今世俗话而言,乃是帝王统治传习录。此在清世宗雍正五年(1727)十一月上谕有所表露:

上谕内阁:朕览明太祖所著《洪武宝训》一书,词义周详,诰诫谆切。所以教其子孙臣庶者亦费苦心。但明太祖起自布衣,奄有天下。虽姿性过人,而其识见尚局于卑隘,其规模未臻于广大。盖缘文过其实,言行多不能相符。而议论自相矛盾者有之。朕观尧舜授受心法,惟有一中治世之道,必事事合乎时中,始为至善。我太祖、太宗、世祖、圣

◆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

祖相承之神谟圣烈，合于大中至正之道者，已经敬辑圣训，垂为世法。而从前史册所载历代帝王之举动言论，每于中道之权衡，或未能悉协。大抵由于时势之所值不同，故政治训辞亦因之而有偏向。后之论者，遂不能无疑议于其间。朕意欲将经史所载历代帝王之嘉言懿行，可以绍执中建极之心传者，采录成书，为后世子孙之法鉴。著派翰林官分任纂修，陆续进呈，朕亲加酌定。^①

至于《圣谕广训》，原只简单十六条要目，自康熙九年施行以来，反复用于士绅庶民之诱教，再加雍正之推行解析亦不过一万字之书，施行至于民间，使士子默诵，庶民传习，务求其普及广远。其功能自在教化，质言之，实是通行全国训世扰民之教令。今日白话，即是一种统治工具与技术。本文主题，当然不是讨论“十朝圣训”，而只以《圣谕广训》为探索对象。

自康熙九年至雍正初年，清廷颁行圣谕十六条，正是深入地方府州县，不止考试生员必须默书，实更用宣讲方式由官方推行到民间。可以确知，此种宣讲，甚是频繁，每月朔望或初二日及十六日，一定宣讲两次，大多在学宫即文庙举行。此是士子必到之地，尤其明伦堂乃是士子公开议事较论学问之所，官方规定，是以府学、州学、县学之明伦堂为宣讲场。此种情况连日本亦有记载。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丁卯，来往商贸于福州日本之间，中日商人即有福州明伦堂定期朔望或初二日及十六日宣讲忠孝之教导，虽未记述府学，但有明伦堂记载。此一资料注明为七月二十七日唐通事提供，收载于日本书《华夷变态》卷一三。

实际上，自康熙九年起，“讲圣谕”即形成一个地方官之一种

^① 《大清世宗宪皇帝圣训》卷四《圣学卷》。

活动名称,抑且亦为其地方施政一项要目。“讲圣谕”原未规定主讲人为谁,而地方高官往往亲自客串几场,以示隆重,以为倡率。道光二十六年(1846)八月广东学政全庆初到任,即公告宣示,定于十月初三日亲诣文庙上香,并同时宣讲圣谕。^①官至学政尚要宣讲圣谕,清廷推行之力,足可明见。

地方州县村里宣讲圣谕,经长期推行,早已形成固定之礼仪步骤,往往备录于地方志,以见典要。今据《湖南通志》,开具于下:

宣讲圣谕礼。附讲乡约。每月朔望,预择宽洁公所,设香案。届期文武官俱至,着蟒服。礼生唱序班,行三跪九叩首礼。兴,退班,齐至讲所。军民人等,环列肃听。礼生唱恭请开讲,司讲生诣香案前跪,恭奉圣谕登台,木铎老人跪宣读毕,礼生唱,请宣讲圣谕。司讲生按次讲毕。各退。^②

地方宣讲圣谕,不但定有形式礼仪、固定日期,抑且亦公立简明乡约,以共同遵守,此并举《湖南通志》卷七一所载:

凡州县城内及各大乡村,各立讲约之所,设约正一人,于举贡生员内拣选老成有学行者为之。值月三四人,选朴实谨守者为之。置二籍,德业可劝者为一籍,过失可规者为一籍。值月掌之。月中则告于约正而授于其次,每月朔日

① 参见 Public Record Office(PRO), F. O. 233/183 1846 No. 17, 收入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后之中英抗争》(东京:东洋文库,1964),366页。

② 《湖南通志》(清同治四年开局采访,同治十三年编辑,光绪五年开雕,光绪十一年刊竣)卷七一,4页。